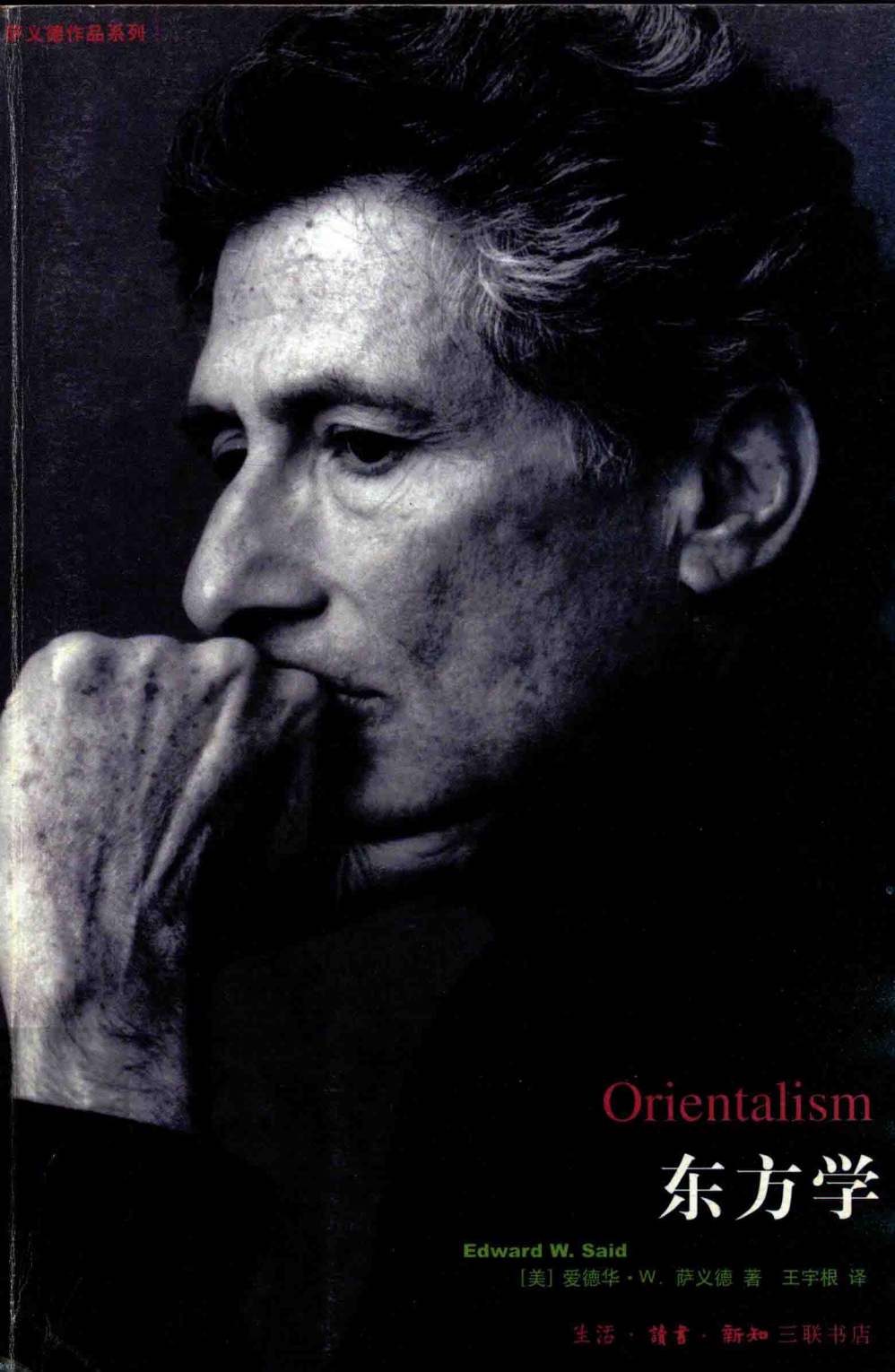


萨义德作品系列



Oriental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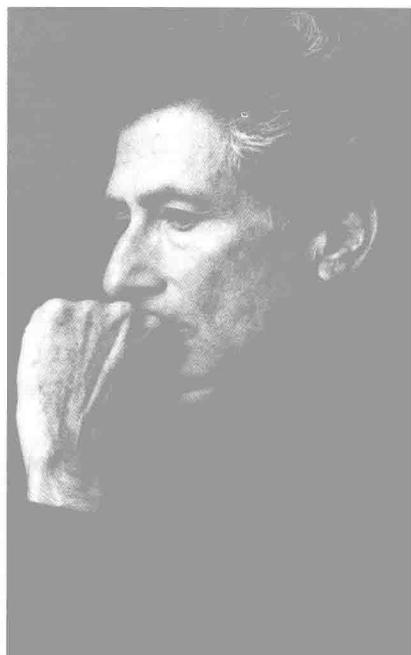
东方学

Edward W. Said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王宇根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萨义德作品系列 |



Orientalism

东方学

Edward W. Said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王宇根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学/(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5 (2007.7重印)

(学术前沿)

ISBN 978-7-108-01260-9

I. 东… II. ①萨…②王… III. 东方学 IV. K1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37371号

责任编辑 叶彤

封面设计 罗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98-16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9年5月北京第1版

2007年7月北京第2版

2007年7月北京第3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张 17.375

字 数 390千字

印 数 17,001-22,000册

定 价 30.00元

## 2003 年版序言

九年前,即 1994 年春,我为《东方学》撰写了一篇后记,试图澄清我确信已说和未说的话。我强调的不仅是 1978 年我的书出版后所引发的众多讨论,而且是一本关于“东方”的种种表述的著作是如何不断地被人们错误地表述和曲解的。今天,面对同样的问题,我竟然发现自己更多地感到的是滑稽而不是恼怒,这充分表明岁月不饶人,我垂垂老矣;随着老年的临近,对事物的期望和说教的热忱也自然随之减退。我在知识、政治和个人方面的重要导师伊克巴·阿哈迈德<sup>①</sup>和易普拉欣·阿布-卢格哈德<sup>②</sup>(他是本书题献者之一)最近相继离世,不仅给我带来了悲伤、损失和无奈,也激发了我某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倔强。但这根本不是保持乐观的问题;而是要对正在进行的永无止境的解放与启蒙进程继续怀有信心,在我看来,这为知识分子的使命确定并指明了方向。

---

<sup>①</sup> 伊克巴·阿哈迈德(Eqbal Ahmad, 1933—1999),巴基斯坦学者、作家和政治活动家。阿哈迈德 1933 年出生于印度比哈尔邦。1999 年 5 月病逝于伊斯兰堡。作为不向权力屈服的知识分子,阿哈迈德致力于反对歧视压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改变世界对中东问题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的错误认知。阿哈迈德去世时,萨义德在开罗的《金字塔周刊》发表文章《一场真实的斗争,一个好人》纪念这位挚友。——译者注

<sup>②</sup> 易普拉欣·阿布-卢格哈德(Ibrahim Abu-Lughod, 1929—2001),学者、政治活动家。他 1929 年出生于雅法,后到美国求学,进行关于阿拉伯世界的研究。作为北美地区首屈一指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卢格哈德投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并且关注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运动。1977 年,卢格哈德当选巴勒斯坦国会成员,1991 年辞去国会职务。卢格哈德是萨义德生前好友,被萨义德誉为“巴勒斯坦最重要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萨义德曾将多部作品题献给他。——译者注

不过,《东方学》继续被讨论,并且在全世界被翻译为 36 种文字,这仍使我感到惊异。感谢我亲爱的朋友和同事加比·彼得尔伯格(Gaby Peterberg)教授所付出的努力,他曾任教于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现执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使本书的希伯来文版本得以出版并在以色列读者和学生中间引起广泛的讨论和辩论。此外,本书的越南语版也在澳大利亚的资助下得以面世。我希望这样说并不过分,即本书提出的命题似乎为印度支那打开了一个新的思想空间。无论如何,这给了我巨大的喜悦,作为一名作者,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我的作品会如此幸运,因为人们对我书中所作所为的兴趣并没有完全消退,尤其是在“东方”本身众多不同的土地上。

当然,部分地是因为中东、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继续酝酿着大规模的变化、斗争、争论以及——就在我写作这篇序言的时候——战争。多年以前我就说过,《东方学》是环境的产物,而且这些环境从本质上是难以控制的。在我的回忆录《格格不入》(1999)中,我描述了我所成长的奇怪而矛盾的世界,为我本人和我的读者提供了对巴勒斯坦、埃及和黎巴嫩各种背景的详尽解释,我认为这些背景造就了我。但是,那仅仅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讲述,它并未涉及我在 1967 年阿以战争后所开始的政治生涯的全部岁月。战争的余波所及(以色列仍然军事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戈兰高地),对我们这一代阿拉伯人和美国人而言生死攸关的那些重要的斗争条件和思想信念似乎仍然在继续。然而,我想再次申明的是,使我的这本书——在此意义上说,我的整个学术生涯——得以可能的是我作为大学学者的生活。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和问题,美国的大学——尤其是我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能够以近乎乌托邦的方式进行反思和研究的地方之一。我从未教授过关于中东的任何课程,我

接受的训练和工作都主要是欧美的人文学，我是一个从事现代比较文学研究的专业学者。是大学以及与两代一流的学生和出色的同事所进行的教学工作使得本书所包含的那种审慎的思考和分析性的研究得以可能。尽管本书指涉许多迫切的现世问题，它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本关于文化、观念、历史和权力的著作，而不是关于中东政治的著作。这是我最初就有的想法，时至今日，这一想法对我而言则显而易见、更为清晰了。

但是，《东方学》这本书与当代历史的动荡和喧腾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书中，我相应地强调无论是“东方”这一用语，还是“西方”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由人为努力所构成，部分地在确认对方，部分地在认同对方。这一极度的虚构很容易被人操纵，对集体激情的组织和利用从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那么明显；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对恐惧、憎恨、嫌恶以及桀骜不驯的自尊和傲慢的调动——这一调动大多与处于一方的伊斯兰和阿拉伯人和处于另一方的“我们”西方人有关——成了一项大规模的事业。《东方学》以对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描写为开端，这场战争结束于1990年，但是暴力与丑恶的人类流血事件却延续至今。我们经受了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失败，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sup>①</sup>爆发以及遭到再次入侵的西岸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

---

<sup>①</sup> Intifada，西方媒体称其为“起义”(uprising)，国内有的学者称为“石块起义”。这种起义的最主要方式是所谓的“西方民众不服从运动”，是一种非暴力的方式，主要包括商店关门、抵制以货、劳动力罢工、在死难者葬礼上举行示威游行、悬挂巴勒斯坦国国旗、辞退税收官以及多种多样的政治不合作；另外，建立自办的教育、社会、经济、政治机构也成为非暴力抵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指2000年9月因当年的戴维营峰会没有达成任何和平协议而直接导致的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在这次起义中，沙龙领导的以色列右翼政府上台，并反对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交由巴勒斯坦人控制。这场起义对当地的经济带来巨大破坏，也带来人员的大量伤亡。——译者注

的可怕苦难,在那里,以色列使用F-16战机与阿帕奇直升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例行集体惩罚行动。自杀性炸弹袭击现象充分显现出了它具有的可怕的破坏性,当然没有什么比“9·11”事件及其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更骇人听闻、更具有末日预言的昭示意义了。正当我写作本文时,美英对伊拉克非法的和未经授权的入侵和占领正在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匪夷所思的物质掠夺、政治动荡和变本加厉的侵略。这都被认为是那个被称作文明冲突的一部分,它无休无止、无法平息、不可救药。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不过,我仍希望我能够说美国对中东、阿拉伯人和伊斯兰的一般理解业已取得少许改善,但是,唉,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各种原因,欧洲的情形看起来要好得多。美国所存在的麻木冷酷的态度,蓄意贬损的化约概括和必胜主义的陈词滥调的牢牢控制,粗鲁无礼的强权统治,加之对异见人士和“他者”的轻率蔑视,已经在对伊拉克的图书馆、博物馆的抢掠洗劫和摧毁中找到了对应。我们的领导人和他们的走狗文人看起来并不能理解历史不能像一块黑板那样擦干净,以便“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未来写上去,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到这些低等民族身上,让他们遵从。我们经常听到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高官高谈阔论改变中东地图,似乎众多的古老社会和无数民众可以像罐子里的花生一样被摇匀。但是,这种事情对于“东方”这一半神话式的建构而言已是司空见惯。自从18世纪末拿破仑入侵埃及以来,这种半神话式的建构就不断被权力制造、再制造,并通过一种对其有利的知识形态发挥作用,宣称这就是东方的本质,我们必须相应地予以应对。这一过程中,包含着无数的形形色色的历史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民族、语言、经验和文化的历史积淀,全都被弃置不顾,或者被忽略,与那些从巴格达图书馆和博物馆中带出来的被磨成毫无意义的

碎片的宝物一起弃置在沙堆上。我认为,历史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造就的,就像它能够被毁掉和重写一样,历史总有着各种各样的沉默与省略,总有着被强加的形塑和被容忍的扭曲,以此,“我们的”西方、“我们的”东方就成为我们拥有并听从我们指挥的属于“我们的”东西。

我需要再次申明的是,我也没有“真正的”东方来据理力争。但是,我对那个地区各民族的力量和才智,对他们为自己是什么和将要成为什么的远景而进行的不懈斗争怀着无比的敬意。借口他们落后、缺乏民主和剥夺女性权利,而对当代阿拉伯和穆斯林社会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和有预谋的攻击的人全然忘记了诸如现代性、启蒙和民主这样的理念,绝不是如此简单和可以达成共识的概念,绝不像在起居室里找得到或找不到复活节彩蛋那么简单<sup>①</sup>。那些以外交政策的名义发言,却没有活生生的认识(或者是任何现实中的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的知识)的浅薄空洞的时事评论员,以惊人的漠不关心捏造出一片贫瘠的想象的风景,随时供美国霸权在那里建造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的仿制品,他们对这种根本不会在斯威夫特式的 Lagado 学院<sup>②</sup>外存在的东西甚至没有丝毫怀疑。

我还想要论说的是,出于从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自身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解、同情、细心的研究和分析而得到的关于这些民族和这些时代的知识,与作为一场全面的自我肯定、好斗和赤裸裸的战争的一部分的知识——如果这也可以称作知识的话——是不一样的。毕竟,为达到共存和扩大人道主义视野的目标而理解

---

① 在西方国家,其中藏着礼物的复活节彩蛋代表了意外惊喜和暗藏玄机。——译者注

② 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皇家学院名。在小说中,斯威夫特讽刺了流行于这座学院中的只单纯依靠理论的不切实际的学风。——译者注



的意愿,与以控制和外部统治为目标的努力是不同的。一小撮未经选举的美国官员(他们被称为胆小的鸡鹰,因为无一曾为军方服务)完全基于与统治世界、安全控制和资源稀缺有关的意识形态理由拼凑了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打击一个业已千疮百孔的第三世界独裁政权,掩盖其真实意图,极力加速它的进行,并且得到了背叛了学术良知的东方学家们的鼓吹和论证。这不啻是历史上的一场知识灾难。对乔治·W. 布什的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施加重要影响的是伯纳德·刘易斯<sup>①</sup>和佛阿德·阿扎米<sup>②</sup>这类人,这些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专家协助美国鹰派思考像阿拉伯的思维方式和唯有美国强权方能逆转伊斯兰教数世纪以来的衰落这类荒诞不经的问题。今天,美国的书店充斥着各种蹩脚的长篇大论,它们被冠以关于伊斯兰与恐怖主义、伊斯兰本质解剖、阿拉伯的威胁以及穆斯林的恐怖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标题,这些文章都是由不懂装懂的政治辩论家们写的,他们的知识则来自于被认为洞悉一向被视为“我们”肉中可怕的尖刺的、奇怪的东方民族心灵的专家们,而那些东方民族一向是扎进“我们”血肉中的可怕的尖刺。与这种专门制造和煽动战争的专业知识如影随形的则是像有线新闻电视网(CNN)和福克斯(Fox)电视台这类无所不在的世俗媒体,加上众多福音派和右翼电台主持人,以及难以数计的通俗小报,甚至还有中产趣味的杂志,他们都喋喋不休地重复那些一成不变的未经证实的虚构和笼统的归纳,以煽动“美国”与外国魔鬼相抗。

伊拉克确实存在各种极为糟糕的弊端,确实有一位骇人听闻

---

①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美国伊斯兰教及中东史研究专家,在美国学界被称为相关领域的“大师”。——译者注

② 佛阿德·阿扎米(Fouad Ajami),黎巴嫩裔美国中东问题专家。——译者注

的独裁者——他多半是由美国的政策在过去 20 年中造成的，但是如果伊拉克成为世界最大的香蕉和柑橘出口国的话，那当然就不会有战争，不会要歇斯底里莫名其妙地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会将大量陆军、海军和空中力量从 7000 英里之外搬运来摧毁一个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也几乎没有听说过的国家，而所有这一切都打着自由的旗号。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经过精心编排的认识，即那里的人与“我们”不同，他们并不欣赏“我们的”价值观——这正是我在本书中对其产生和流播进行过描述的传统东方主义教条的核心——也就不会有战争了。

五角大楼和白宫的美国顾问们使用着同一套陈词滥调、同一套侮辱性的固定观念、同一套论证霸权和暴力（毕竟，合唱队这么唱道，霸权是他们能理解的唯一语言）合法的依据，与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荷兰征服者，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西非的英国军队，印度支那半岛和北非的法国军队所征用并雇用的专业学者们如出一辙。如今加入到这些人阵营中的是成群结队涌入伊拉克的私人承包商和怀着热望的企业主，他们将接受委任负责从编写教科书和起草宪法到改造伊拉克的政治生活和它的石油工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帝国在其官方论述中都说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它面临的情况是特殊的，它肩负启蒙开化、带来秩序和民主的使命，并且它是不得已才诉诸武力。更为悲哀的是，总是有一群通同一气的知识分子用平静的声调论说慈悲或无私的帝国存在的可能性，就好像人们不应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由最近的“文明使命”所带来的毁灭、痛苦和死亡。

美国对帝国论述的一个特殊贡献就在于方针政策术语的专业化。不需要阿拉伯语、波斯语甚至法语，你就可以煞有介事地奢谈阿拉伯世界是如何需要民主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些经验仅仅局限在华盛顿特区的好战、可悲而又无知的政策专家们，却费

尽心机地炮制出了关于“恐怖主义”和自由主义、或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美国外交政策、或者历史终结论的书籍，所有这些书都只是极力想吸引人们的注意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对诸如真实性、反思或真实的知识这类问题默然不顾。他们在意的是这听起来是多么的有效和有谋略以及谁会拥护这样的主张。这种将一切本质化的废话的最龌龊之处就在于人类遭受的沉重苦难和痛苦就这样轻易地被消解而烟消云散了。记忆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被一笔勾销，就像这句稀松平常而又武断傲慢的美国谚语：“你就是历史”。

我的书出版 25 年后，《东方学》仍然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现代帝国主义是否已经终结，抑或自两个世纪前拿破仑进入埃及以来，它是否仍在东方继续。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被告知，研究受害者的情况以及对遭受帝国的蹂躏耿耿于怀只是逃避当前的责任。现代东方学家说，你们失败了，你们做错了。这当然也是 V. S. 奈保尔<sup>①</sup>对文学的贡献，他觉得帝国的受害者只管号啕痛哭，却任凭他们的国家走向覆灭。但这一对帝国主义入侵的算计（按：指奈保尔的表达）是多么肤浅，它多么草率地忽略了帝国对一代代“低等”民族和“附属种族”人民生活所造成的扭曲，它多么不情愿面对在漫长的岁月里帝国是如何继续渗入到诸如巴勒斯坦人、刚果人、阿尔及利亚人或伊拉克人的生活之中。我们允许犹太人大屠杀永久地改变我们时代的意识，为什么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没有产生同样的认识论突变？东方学接下来做什么？想想这条始自拿破仑的路线，它伴随着东方研究的兴起和

---

<sup>①</sup> V. S. 奈保尔(V. S. Naipaul, 1932— )，印度裔英国作家。1993 年，他成为英国戴维·柯翰文学奖的首位获奖者，2001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奈保尔是一位世界主义作家，认为这源于自己所具有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带来的无根状态。——译者注

对北非的武装占领而伸展,并以类似的方式在越南、埃及和巴勒斯坦,以及整个二十世纪期间围绕石油的斗争和在对海湾、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富汗的战略控制中延续着。而后对位地想一想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的崛起,它贯穿于自由独立的短暂时期,贯穿于军事政变、叛乱、内战、宗教狂热、非理性斗争及强硬地凶残对抗晚近“原住民”群体的年代。这些阶段和年代,都产生出了各自的有关他者的被歪曲的知识、各自的简化形象、各自的争讼不休的激辩。

我在《东方学》中的想法,乃是以人文主义批评去开拓斗争领域,引入一种长期而连续的思考与分析,以之取代那些短小的随兴之辩,后者禁锢思想、意气用事,使我们带着标签陷于势不两立的争论之中,这种争论不以理解与知识交流为目的,倒是意在达成一种好斗的集体身份。我曾把我所试图做的称为“人文主义”,尽管这个词受尽了精致的后现代批评家们的揶揄拒斥,但我仍固执地继续使用它。我所谓人文主义之首要者乃是竭力化解布莱克<sup>①</sup>所指的“心魂锻造的镣铐”(mind-forg'd manacle),唯如此方可历史地、理性地运用心智,臻于反思性理解和使真实的情况昭然若揭之境。复次,人文主义的维持得益于与其他诠释者、其他社会与时期形成的某种意义共同体:是故,严格来讲,并不存在与世隔绝的人文主义者。

这也就是说每一领域都与其他领域相关联,在我们这个世界中,没有什么是与世隔绝的,也没有什么纯然不受外界的影响。然而令人颇觉沮丧的是文化批判研究越是印证上述观点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所具有的影响却反而越来越弱,而像“伊斯兰 vs. 西方”这种简单化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却占据越来越多的地盘。

---

① 威廉姆·布莱克(Blake, 1757—1827),英国诗人、艺术家。——译者注

对于我们这些由环境所迫实际上生活在伊斯兰与西方造就的多元文化中的人而言,长久以来,我感到我们这些学者与知识分子肩负着一种特殊的知识与道德责任。我认为将简化的表述和抽象、有势力的思想复杂化和/或否弃对我们而言责无旁贷,这些表述和思想使心智脱离了具体的人类历史和经验,使之步入意识形态的虚构、形而上学的对抗和集体激情的境地。这并不是说对不公正和苦难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谈论,而是说需要将我们的行动充分地植根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现实的语境中。我们的责任是拓展讨论的领域,而不是设置局限,唯主流权威马首是瞻。在过去的35年间,我耗费了大部分生命来争取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自决权,但与此同时,我总是力图充分关注犹太民族的现实以及迫害和种族屠杀带给他们的痛苦。最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以色列争取平等的斗争应以一个人道的目标为指导,即共存,而不是变本加厉的压迫和拒斥。我指出东方主义与现代反犹主义有着共同根基并非空穴来风。因此,独立知识分子提出替代性模式来改变简单化约和褊狭的模式就殊为必要,后者建立在久远以来弥漫于中东和其他地方的相互敌意的基础上。

现在我来谈谈这个对我的著作而言至为重要的不同的替代性模式。作为一个文学专业的人文主义者,我40年前已经接受了比较文学专业的训练,如今也算是老资格了,这一专业的要旨可回溯至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德国。我还必须要提到此前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创造性的卓越贡献,这位那不勒斯哲学家和语文学家的观念预示并随后融入了我将提到的一系列德国思想家的思想。它们属于赫尔德(Herder)和伍尔夫(Wolf)以及后来的歌德(Goethe)、洪堡(Humboldt)、狄尔泰(Dilthey)、尼采(Nietzsche)、加达默尔(Gadamer),最后是二十世纪伟大的罗曼斯语语文学家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

bach)、莱奥·施皮策尔(Leo Spitzer)和厄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的时代。对目前这一代年轻人来说,语文学这一观念乃是某种老掉牙的陈腐不堪的东西,但语文学实际上是阐释性艺术中最基本和最有创造性的。在我看来,最令人激赏的例子就是歌德对伊斯兰的广泛兴趣,尤其是对哈菲兹<sup>①</sup>的兴趣,这种强烈的热情促使歌德创作《西东合集》(*West-Östlicher Diwan*),并且影响了歌德后来关于“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观念——将世界文学当作交响乐式的整体来研究,在理论上可以理解为保持每一部作品的个性,又不丧失总体的视野。

随着今天全球化的世界以我已经谈及的某些令人沮丧的方式变得日益紧密,我们或许正在走向被歌德的理念所明确防止的标准化和同质化,想到这里,令人感到极大讽刺。奥尔巴赫在1951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世界文学的语文学》(“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的论文中所提出的正是这一点——那是在战后不久,亦即冷战刚开始的时候。他于1946年在伯尔尼出版的皇皇巨著《论摹仿》(*Mimesis*)却是在他作为战时流亡者,在伊斯坦布尔教授罗曼斯语的时候写作的。《论摹仿》意在成为从荷马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西方文学所表现出的既多样又具体的现实的证明。但是,读完这篇写于1951年的论文,你会发现,对于奥尔巴赫而言,这本伟大的著作却是一个时代的挽歌,那时人们能够从语文学的角度、从具体的角度、从感性的角度和从直觉的角度

---

<sup>①</sup> 哈菲兹(Hafiz),本名舍姆斯丁·穆罕默德,中世纪波斯著名诗人、苏菲主义学者,在伊斯兰教义学、教法学和文学方面颇有造诣。他的诗歌以手抄本和民间艺人吟唱的方式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被称为“隐遁者的心声”。歌德曾盛赞说:“你是一艘张满风帆劈波斩浪的大船,而我则不过是在海涛中上下颠簸的小舟。”——译者注

来阐释文本,利用博学多识和对数种语言驾轻就熟来支持歌德在理解伊斯兰文学时倡导的那种理解。

积极掌握各种语言和历史是必要的,但还远远不够,这并不比机械地汇集事实来弄清楚像但丁这样的作者到底是怎么回事所获得的更多。奥尔巴赫及其先行者们谈论和试图实践的那种语文学理解的先决条件,就是同情地、个人化地进入到书面文本的生命中,从其时代、其作者的角度来审视。运用于世界文学的语文学并不是要去疏远和敌视另一个时代和其他不同的文化,而是要纳入深沉的人文主义精神,投入慷慨之情,甚至于可以说献以殷勤之意。因此,诠释者在其心灵中积极地为一种外来的“他者”创造一个场所,而创造性地为否则是陌生和遥远的作品建立一个场所,则是诠释者的语文学使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一切显然在德国遭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削弱和摧残。战后,奥尔巴赫悲哀地指出,思想的标准化,以及愈演愈烈的知识专门化,已使他所代表的那种调查性和永远热衷于探究的语文学工作逐渐丧失了发挥的机会,唉,更令人沮丧的事实是,自奥尔巴赫1957年去世以来,人文研究思想和实践的规模已收缩,其中心地位也已削弱。以档案研究为基础的书籍文化和曾经支撑着人文主义这一历史学科的基本心灵原则也消失殆尽。我们今天的学生不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阅读,而是经常被可在互联网上和大众媒体上获得的鸡零狗碎的知识分散了注意力。

更糟糕的是,教育受到经常由大众媒体散布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的正统观念的威胁,这些媒体无视历史地、耸人听闻地聚焦于远方的电子战争,以此给观众一种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感,事实上却遮蔽了现代“清洁”战争造成的可怕痛苦和毁灭。媒体影像把未知的敌人妖魔化,给他们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服务于继续煽动和激怒人民这一总目的。媒体影像太受关注,往往会在后

“9·11”时代产生的那种危机和不安全时刻被利用。同时作为一名美国人和阿拉伯人，我恳请我的读者切勿低估由五角大楼相对少数的几个文官精英为美国在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政策而阐明的那种简化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里，媒体无休止地辩论并极力鼓吹的主要是恐怖、先发制人的战争和——在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军事预算的支持下——单方面的政权更迭这样的观念，而媒体自己则扮演着制造为政府总路线摇旗呐喊的所谓“专家”的角色。一方面，以色列的沙龙将军曾在1982年为了变更黎巴嫩政府挥师入侵黎巴嫩，并在其间杀害17000名平民，如今他摇身一变成为乔治·W.布什的“和平”伙伴。而另一方面，在美国，对唯有军事力量方能改变世界地图这样可疑的论点也很少听到异议。我亦应指出的是，这二者间绝非巧合。

以人类必须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世俗观念为基础的反思、辩论、理性争论和道德原则已荡然无存并已被为抽象的观念取代，这些观念高唱美国或西方例外论，贬低实际背景的适用性，嘲笑鄙视其他文化。也许你们会说，我从人文主义阐释一下子转向外交政策，这中间缺乏必要的过渡。也许你们还会说，一个挟着前所未有的霸权、拥有互联网和F-16战斗机的现代技术社会，最终必须听从像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sup>①</sup>和理查德·珀尔<sup>②</sup>这样一些令人恐怖的技术政策专家指挥。而他们这班人，一旦战火燃起，谁都不会进行任何实际的战斗，因为这将留待那些不幸的男男女女。但真正失去的东西，是一种对人类生活的密切程度和互相依赖的意识，这种意识既不能被缩减成一个公式，也不能被视为风马牛不相及而弃置一边。甚至建构战争的语言也正变得极端地

---

① 时任布什政府国防部长。——译者注

② 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 1941— )，美国政治家。——译者注



非人化，“我们将要到那儿去，捉住萨达姆，通过干净利落的外部攻击摧毁他的军队，每个人都将认为这是伟大的”，一位国会女议员某晚在国家电视台如是说。对我来说，对我们所处的这一不确定的时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的是，当副总统切尼2002年8月26日发表有关打击伊拉克必要性的措辞强硬的演讲时，他所引述的用来支持军事干预伊拉克的唯一一位中东“专家”，是一个每晚受雇在大众媒体上喋喋不休地重复他憎恨自己的民族并宣布放弃自己的历史的阿拉伯学者。更过分的是，他背后有美国军方和犹太复国主义院外游说团撑腰。此等“知识分子之背叛”正是纯正的人文主义如何堕落为沙文主义和伪爱国主义的征象。

这是全球辩论的一面。在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情况一点也不见得更好。诚如鲁拉·哈拉夫在《金融时代》(*Financial Times*, 2002年9月4日号)上一篇精彩的文章中指出的，该地区已滑入廉价的反美主义，却对美国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缺乏起码的理解。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相对无力影响美国对它们的政策，它们转而将精力用于抑制和镇压自己的人民，造成怨恨、愤怒和绝望的诅咒，这对开放这些社会都无济于事。在这些社会，有关人类历史和发展的世俗观念被失败和挫折以及建基于只知生搬硬套、对其他被视为是竞争对手的世俗知识形式进行排挤、对在嘈杂纷乱的现代世界话语中分析和交换思想无能为力的伊斯兰主义所压倒。伊斯兰“依智提哈德”(Ijtihad)<sup>①</sup>这一非凡的传统逐渐式微，这是我们时代的重大文化灾难之一，其结果是完全见不到对现代世界各种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和个人抗争。正统和教条统

---

<sup>①</sup> Ijtihad, 其字面的意义为“力图建立自己对事件、法律、教义的观点或判断”，在伊斯兰法律系统未底定前，Ijtihad泛指对伊斯兰教义的推断诠释，但在现代伊斯兰中则指理性地再诠释教义与法规。——译者注